季札及其故里延陵考略

张承宗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本文对季札的主要事迹及其后裔，对季札的精神遗产与历史文化价值，对其故里延陵的地理沿革及与季札相关的历史遗迹，逐一作了考察。

关键词：季札事迹；精神遗产；故里延陵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8)01-0109-05

一、季札的主要事迹及其后裔

吴国自太伯奔吴建国后，凡五世而传位至周章。自周章始又十四世传位至寿梦。寿梦即位后，吴国逐渐强大。寿梦正式称王，成为吴国称王的第一个国君。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四子季札。季札年龄最小，而最为贤能，最有才干。因此，寿梦有把王位传给季札的意图。其三位兄长也表示同意。但季札考虑到这样做不符合当时传统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的制度，有可能引发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因而坚决不肯接受，“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1] 1449。

吴王诸樊元年（前560），“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坚决不同意，说：“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由于“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1] 1450。“十三年（前548），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1] 1451。

吴王余祭四年（前544），季札奉命出使鲁国。《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延陵季子使鲁，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1] 1538。季札对音乐很有造诣，他十分注意学习中原的礼乐制度。由于鲁国的国君是周公的后代，鲁国的宫廷礼乐中保存了周天子的礼乐。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首先请求观赏周乐。鲁襄公命乐工为他演歌了声曲《周南》、《召南》，他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2] 1161后来，他观赏了乐工们演歌的春秋时代中原各国的乐舞，闻歌《小雅》后，他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2] 1164然后，他又聆听与观看了周代、商代、夏代的乐舞。在欣赏周武王时期的乐舞《大武》后，他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2] 1165在欣赏殷代成汤时期的乐舞《韶濩》后，他说：“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2] 1165在欣赏夏禹时代的乐舞《大夏》后，他说：“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2] 1165季札的这次出使鲁国，加强了吴地与中原地区的礼乐文化交流。

季札还是一位十分有政治眼光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离开鲁国后，就出使齐国，对晏子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2] 1166晏子听从季札的劝告，赶快寻找机会交出了权力与封邑，果然在齐国后来的权力斗争中免遭于难。离开齐国后，季札又出使郑国，“见子产，如旧相识”。他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2] 1166季札经过卫国，见到了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与公子朝等人，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2] 1166从卫国又来到晋国，季札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对话，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即将离开晋国时，季札又拜访了叔向，对叔向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2] 1166

在交游方面，季札十分注重人际关系，讲究信义。《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于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1] 1459正是季札的这种人格魅力，使他能在当时的外交舞台上游刃有余。

收稿日期：2007-04-13

作者简介：张承宗（1943— ），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季札这次出使中原各诸侯国回来后，吴国的国内政局及其与邻国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吴、楚之间，互相攻伐，互有胜负。吴、越之间，也时有冲突。吴王余祭死后，其弟余昧继承了王位。余昧死后，季札谦让，不肯继承王位，回到自己的封邑延陵隐居了起来。于是，吴国国人就立余昧之子僚为王。僚的继位，引起了诸樊的儿子公子光的不满，他就暗中招纳贤士，打算伺机除掉僚，夺回王位。

吴王僚八年（前519），使公子光伐楚，打败楚军，公子光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楚将伍子胥因父兄被楚平王所杀投奔吴国，他与勇士专诸合谋，帮助公子光夺取王位。

吴王僚十三年（前514）春，吴又乘楚国新丧国君而伐楚，“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1]1463。不料楚国早有防备，派军队截断了吴军的后路，吴军进退两难。公子光趁机发动政变，指使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并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也就是后来通常所说的吴王阖闾。

季札获悉国内发生变故，赶快回到吴国。季子回国后，自知无能为力，无法改变政局，但态度十分平静，他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引杜预曰：“吴自诸樊以下，兄弟相传而不立嫡，是乱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讨光，故云。”[1]1465基本上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季札内心对吴王阖庐这种兄弟相残的做法极其不满。由于当初是吴王僚派他出使晋国的，所以他到僚的墓前复命，并哭祭一番，然后回到自己的封邑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朝廷。季札死后，孔子有感于季札的仁德，为其墓手书十字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引用孔子的话，感慨地说：“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1]1475

后来，阖庐、夫差父子穷兵黩武，走上了与诸侯争霸的道路。吴国最终被越王勾践所灭。吴国宗室四处逃亡，为了表示故国之思，就以国为氏，改姓吴氏。从此，姬姓吴氏分为两大支：一支是吴王夫差的后代，人数不多；一支是延陵季子的后裔，人丁兴旺。《通志·氏族略二·吴氏》载：“勾践灭吴，子孙以国为氏。季札避国，子孙居齐、鲁之间。”[3]449后来逐渐散居于各地。从现存的吴氏宗谱来看，大多数吴氏宗谱都自称是延陵季子的后代。

延陵氏也是延陵季子之后。《元和姓纂》称季札封延陵，后裔就以地为氏，改姓延陵氏。如战国时期，有赵襄子谋臣延陵玉，据《通志·氏族略三·延陵氏》载：“姬姓，吴季札居延陵，因氏焉。亦为延州来氏。《吕氏春秋》：延陵玉，赵襄子谋臣。”[3]459又《宋书·谢晦传》载：元嘉三年（426），宋文帝刘义隆讨伐谢晦，“晦走，左右皆弃之，唯有延陵盖追随不舍”[4]1362。

由于季札先封于延陵，后又封于州来，所以又称延州来季子。《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云：“襄三十一年《左传》赵文子问于屈狐庸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杜预曰‘延州来，季札邑也’。昭二十七年《左传》曰‘吴子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杜预曰‘季子本封延陵，后复封州来，故曰延州来’……州来本为楚邑，吴光伐灭，遂以封季子也。”[1]1451《通志·氏族略三·延州氏》载：“姬姓，吴季札居延州来，因氏延州。”[3]459缘于此，季札后裔就有以延州来氏为姓氏的，简称延州氏。

二、季札的精神遗产与历史文化价值

季札的精神遗产为后世所称道者，首先是其仁德之心与谦虚退让的风格，与历史上的许由、伯夷、太伯等前贤极为相似。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并作为政治上如何为人处事、出入进退的借鉴。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确立的时期，同时也是儒家经学逐步取得独尊地位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主流的时期。季札的精神操守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一致，也就成为当时士人们提倡与学习的榜样。如：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蔡泽曰：“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1]2423《张耳陈馀列传》载太史公曰：“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1]2586

《汉书》载东方朔口才敏捷，说话诙谐，曾劝诫汉武帝要“诚得天下贤士”，其所列举人物中就有“延陵季子为水衡”[5]2860。又载会稽人郑朋为了巴结萧望之，曾说：“下走将归延陵之皋。”[5]3286郑朋表面上很谦虚，似乎要向季札学习，萧望之就与之相见。后来发现郑朋是一个两面派，行为倾邪，并非真正要效法季札，萧望之就与他断绝了往来。

《后汉书》载循吏任延拜会稽都尉，“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6]2460。又载刘秀即帝位后，冯衍曾致书田邑，说：“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6]971儒学之士丁鸿，与鲍骏相友善，曾一起师从桓荣，受《欧阳尚书》。后来丁鸿未能继承其父的封爵，遇见鲍骏，假装不相识。鲍骏当即批评他，说：“昔伯夷、吴札乱世权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6]1263丁鸿听后，大为感悟，乃回去继续担任教职。汉顺帝时，庞参因“忠直，数为左右所陷毁”。段恭上疏，说：“伏见道路行人，农夫织妇，皆曰‘太尉庞参，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昔白起赐死，诸侯酌酒相贺。季子来归，鲁人喜其纾难。”[6]1691吴祐之父吴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吴祐劝谏，“恢乃止，抚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由于吴祐担心“杀青”扰民，深得季札安民之精神，故为其父所采纳。又《党锢传》载延笃贻刘祐之书曰：“昔太伯三让，人无德而称焉。延陵高揖，华夏仰风。”[6]2200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袁绍围攻臧洪，命陈琳写信劝降。臧洪回答说：“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来者侧席，去者克己，则仆抗季札之志，不为今日之战矣。”[6]1888由于袁绍不得人心，臧洪不愿投降，结果战败，被俘而杀。建安年间，曹操率“大军南征还，以温恢为扬州刺史，（蒋）济为别驾。令曰：‘季子为臣，吴宜有君。今君还州，吾无忧矣。’”[7]450可见曹操知人善任，胜过袁绍。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多故，政局变幻无穷。在经学衰微、玄学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士人们仰慕老庄，也就效法延陵季子，不愿出仕，以求保全。同时，也有史学家坚持以儒学正统思想与延陵季子的精神相结合，来褒贬是非，评鉴史事。在地方官员与封建帝王中，也有提倡季子精神的，但有真有假，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季札在音乐文化上的造诣，不仅影响南朝，而且影响北朝。如：

孔融对虞翻能效法延陵季子，避乱于东南，十分羡慕。其答虞翻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7] 1320 曹植在曹丕称帝后，自知无力与兄争衡，决意效法延陵季子，退而有守，乃上书曰：“臣才不见效用，常慨然执斯志焉。若陛下听臣悉还部曲，罢官属，省监官，使解玺释绂，追柏成、子仲之业，营颜渊、原宪之事，居子臧之庐，宅延陵之室。如此，虽进无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犹松、乔也。”[7] 575

西晋贾后迫害愍怀太子之事发生后，有人责备张华不能抗节廷争。张华回答说：“先圣之教，死而无益者，不以责人。故晏婴，齐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难。季札，吴之宗臣，不争逆顺之理。”[8] 1076 王济认为：“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8] 1232 在识鉴人物方面，他们都欣赏季札。名士嵇康自认为身逢乱世，决意效法延陵季子，不屈从强权而拒绝做官。其与山涛书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8] 1371 夏侯湛作《抵疑》以自广，说：“季札抗节于延陵，杨雄覃思于《太玄》……仆虽不敏，窃颇仿佛其清尘。”[8] 1496 文士王沈作《释时论》，把颜回与季札相提并论，说：“伯成、延陵，高节可慕。”[8] 2383 《晋书·孝愍帝纪》史臣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8] 136 《晋书·乐志上》亦云：“平王逢乱，礼废亲疏，乐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闻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而列壤称孤，各兴吟咏。”[8] 675 这些评论，显然都是对西晋灭亡之原因的有感而发。

东晋史家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儒学正统思想与延陵季子的精神来褒贬是非、评鉴史事。他主张以蜀汉为正统，贬曹魏为闰位，说：“若以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嚣据陇，公孙帝蜀，蜀陇之人虽服其役，取之大义，于彼何有。且吴楚僭号，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见贬绝。宣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8] 2156

南朝史家沈约记述其家族事迹，称沈林子之子沈邵“为安成相。在郡以宽和恩信，为南土所怀。郡民王孚有学业，志行见称州里，邵莅任未几，而孚卒，邵赠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学主簿王孚，行洁业淳，弃华息竞，志学修道，老而弥笃。方授右职，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荐以特牲。缅想延陵，以遂本怀’”[4] 2460。沈邵的为政风格及对王孚的表彰，正是其对延陵季子精神的实践与提倡。梁朝侯景之乱发生后，王僧辩等奉表，劝湘东王萧绎称帝。萧绎以“欲追延陵之逸轨”[9] 119 为托词，表示要效法季札，不即帝位，其实只是一种姿态。后来，萧绎不仅称帝，而且与萧纪同室操戈，招致西魏军攻入江陵，不仅结束了他的生命，还给南朝带来无穷灾难。《隋书·文学传序》曾以“延陵之听”为标准，严厉批评南朝音乐文化中的消极影响，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10] 1730

延陵季子，作为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位代表人物，在北朝境内也有相当影响。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凉州后，宗钦来到当时的北魏都城，“拜著作郎。钦与高允书曰：‘昔皇纲未振，华裔殊风，九服分隔，金兰莫遂，希怀寄契，延想积久。天遂其愿，爰遘京师。才非季札，而眷深孙乔。德乖程子，而义均倾盖。旷龄罕遇，会之一朝。’”[11] 1155 魏宣武帝元恪即位后，李彪“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表曰：“观《雅》、《颂》，识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听《风》而知始基，听《颂》而识盛德。至若尼父之别鲁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谓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者矣。”[11] 1394 北齐颜之推撰《观我生赋》，词曰：“返季子之观乐，释钟仪之鼓琴。”[12] 623 《魏书·乐志》曰：“大乐感于风化，与世推移，治国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随时隆替，不常厥声。延陵历听诸国，盛衰必举，盖所感者著，所识者深也。”[11] 2826 可见季札在音乐文化方面的造诣之深、影响之大。《北史·魏诸宗室传论》曰：“至如神武之不事黄屋，高揖万乘，义感邻国，祚隆帝统，太伯、延陵未足多也。”[13] 580 这是以太伯、季札的事迹，来与齐神武帝高欢的行为相比较。

唐宋以来，延陵季子的精神影响依然存在，但有时会遭到歪曲，如唐高宗宠爱武则天，废王皇后之后，礼部尚书许敬宗希旨上疏，说：“追踪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14] 2824 于是，皇太子李忠被废。后来，睿宗李旦被迫让位于李隆基时，也说：“朕以寡昧，虔奉鸿休，本殊王季之贤，早达延陵之节。”[14] 168

在大多数情况下，季札精神还是能得到正面理解与阐发的，如唐开元进士元德秀“著《季子听乐论》、《蹇士赋》，为高人所称。”[14] 5051 李侁死后，肃宗李亨下诏，用延陵季子听乐的典故，来称赞其子的音乐造诣，说：“第十二子故兴王侁，毓庆璇源，分华若木，天资纯孝，神假聪明。河间聚书，幼闻乐善之旨。延陵听乐，早得知音之妙。”[14] 3388 唐礼部侍郎杨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尚书左丞贾至也说：“《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14] 3432 这是用延陵季子听《诗》的典故，来衡量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端。《旧唐书·音乐志一》在追溯音乐的源流时，说：“三五之代，世有厥官，故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弦诵之教。洎苍精道丧，战国尘飞，礼乐出于诸侯，《雅》、《颂》沦于衰俗。齐竽燕筑，俱非嚽绎之音。东缶西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各写哇淫之状。乃至播鼗入汉，师挚瘵弦，延陵有自郤之讥，孔子起闻《韶》之叹。”[14] 1039著史者将延陵季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对音乐文化有共同的看法。宋代士人邓若水上疏，曾说：“为陛下之计，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节……策之上也。”[15] 13379《清史稿·乐志一·总论》亦云：“魏文听之而思卧，季札观之而无讥，是知乐之为懿，觇国隆洿，讴歌在民，匪所自致。”[16] 2732都十分重视季札精神与音乐文化的教化作用。

季札精神的又一重要方面，是主张薄葬，反对厚葬，提倡节俭，为后人治丧树立了礼仪规范。

汉武帝时，杨王孙反对厚葬，主张薄葬，说：“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师古曰：“文子称天气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归于土。’”[5] 2909汉成帝时，刘向上疏，说：“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5] 1953

东汉张霸临终遗敕诸子曰：“昔延州使齐，子死嬴、博，因坎路侧，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足藏发齿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6] 1242范冉临命遗令敕其子曰：“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李贤注：“刘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隐。”[6] 2690赵岐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箪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6] 2124。梁鸿幼年，身逢乱世，其父卒后，“卷席而葬”。成年后，“家贫而尚节介”，曾改名换姓，“与妻子居齐鲁之间”。“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到达吴地后，梁鸿“居庑下，为人赁舂……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6] 2768

三国时期，曹丕主张薄葬，作《终制》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延陵葬子，远在嬴、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间，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7] 82

西晋石苞，也豫为《终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8] 1003名将羊祜，“立身清俭……家无余财。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从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于先人墓次。帝不许，赐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顷，谥曰成。祜丧既引，帝于大司马门南临送。祜甥齐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敛之意，帝乃诏曰：‘祜固让历年，志不可夺。身没让存，遗操益厉，此夷叔所以称贤，季子所以全节也。今听复本封，以彰高美。’”[8] 1021羊祜的遗愿，也是季子薄葬。

南朝顾宪之，尊崇延陵季子的薄葬精神而行事，临终为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昼夜。生既不知所从，死亦安识所往。延陵云：‘精气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魂气则无所不之。’良有以也。”[17] 925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与厚葬之争，从思想层面上看，是源于对人死之后是否还有灵魂的认识。这种“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不仅发生在南朝，也出现在北朝。如梁朝刘勰著《革终论》，其辞曰：“季札云：‘骨肉归于土，魂气无不之。’庄周云：‘生为徭役，死为休息。’寻此二说，如或相反。何者？气无不之，神有也；死为休息，神无也……不反则合乎庄周，犹存则同乎季札，各得一隅，无伤厥义。”[9] 748北齐杜弼与邢邵发生争论。杜弼曰：“骨肉下归于土，魂气则无不之，此乃形坠魂游，往而非尽。如鸟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无所不之。若令无也，之将焉适？延陵有察微之识，知其不随于形。仲尼发习礼之叹，美其斯与形别。若许以廓然，然则人皆季子。不谓高论，执此为无。”[12] 351

三、延陵的地理沿革及与季札相关的历史遗迹

延陵为古邑名，本为春秋吴邑，季札所居之封邑。《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1] 1451其地在今江苏丹阳，故丹阳被称为延陵故里。《汉书·地理志上·会稽郡条》载：“毗陵，季札所居。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莽曰毗坛。”师古曰：“旧延陵，汉改之。”[5] 1591《后汉书·郡国志四·吴郡条》载：“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注引《越绝书》曰：“县南城，古淹地。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名延陵墟。”[6] 3490可见两汉时期，延陵已更名为毗陵。

三国时期，人们仍习惯于将季札所居之地域称为延陵；与此同时，延陵这一地望，也成为季札这位历史人物的代称。

《晋书·地理志下·扬州条》载：“毗陵郡，吴分会稽无锡已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太康二年（281），省校尉为毗陵郡。统县七，户一万二千。丹徒，故朱方；曲阿，故云阳；武进，延陵，毗陵，既阳，无锡。”[8] 460按：战国楚云阳邑，秦置曲阿县，治所在今江苏丹阳。三国吴改名云阳，晋又改曲阿，唐天宝元年（742）改名丹阳。

《宋书·州郡志一·南徐州条》载：“晋陵令，本名延陵，汉改曰毗陵，后与郡俱改。延陵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乡立。”[4] 1040《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徐州条》载：“晋陵郡”，辖“晋陵、无锡、延陵、曲阿、暨阳、南沙、海阳”。[18] 247可见西晋太康二年，已分曲阿县置延陵县，隶属于毗陵郡之下，至东晋南朝，沿而未改，其治所在今江苏丹阳西南。

东晋南朝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延陵的军事、经济、文化地位更为凸显。军事上，延陵是从建康通往三吴地区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经济上，延陵的农业状况，经东晋南朝时期的开发，粮食生产有长足进步。文化上，延陵越来越受到文化名人的关注。延陵出现的各种灾异与祥瑞，也频频为史书所记载。其中有些祥瑞，就与季子有关，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如《南齐书・祥瑞志》载：“建元元年（479）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称所领季子庙，旧有涌井二所，庙祝列云旧井北忽闻金石声，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东忽有声铮铮，又掘得泉，沸涌若浪。泉中得一银木简，长一尺，广二寸，隐起文曰：庐山道人张陵再拜谒诣起居。简木坚白而字色黄’。”[18] 354《南史・齐高帝纪》亦载此祥瑞。《南齐书・豫章文献王萧嶷传》载：齐武帝萧赜即位后，“遣嶷拜陵，还过延陵季子庙，观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执牛推问，不许，取绢一匹横系牛角，放归其家。为治存宽厚，故得朝野欢心。”[18] 413

隋开皇中，延陵移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并丹徒县入内。唐初，延陵县复分，还旧治。唐代延陵的文化颇为发达，著名的文化名人有包融。五代后唐庄宗时，“侍真吴氏封延陵郡夫人”[19] 675。因吴姓为延陵季子后裔，故有此封号。

北宋熙宁五年（1072）省延陵县为镇，归丹阳县管辖。南宋绍兴年间，经丹阳知县朱穆等人的兴修水利，延陵的农业生产条件有进一步改善。自从北宋熙宁年间省延陵县为镇后，直到清代，延陵一直属丹阳县管辖。清代常州知府骆钟麟创办延陵书院，对常州与丹阳的文化发展颇有贡献。

与延陵季子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由于年代久远，寻找起来有相当难度。从史书记载与尚存遗迹结合起来看，大致有以下这些：

1. 延陵季子冢

《越绝书》中载：“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里。”上湖在今江苏常州市东。《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引《皇览》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吏民皆祀之。”[1] 1476 暨阳在今江苏江阴县东南长寿镇南。杜佑《通典》载：“晋陵申浦有季子墓。”申浦在今江阴县西的申港镇。这些不同记载，说明季札后裔吴姓族人都希望与延陵季子同处一地。

2. 季札祠

《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引《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头有季札祠。”[1] 1451《旧唐书・狄仁杰传》载：“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14] 2887《新唐书・狄仁杰传》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唐朝时季札祠犹在。

《清史稿・圣祖本纪三》载：康熙南巡时，“御书‘至德无名’额悬吴太伯祠，并书季札、董仲舒、焦先、周敦颐、范仲淹、苏轼、欧阳修、胡安国、米芾、宗泽、陆秀夫各匾额悬其祠”[16] 267。说明当时季札祠依然存在。

3. 延陵季子庙

延陵季子庙，当为季札祠之别称。《南齐书・祥瑞志》、《南齐书・豫章文献王萧嶷传》，《南史・齐高帝纪》、《南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均有关于季子庙的记载，已于前述。这里要补充的是，《陈书》卷21《萧允传》载：“行经延陵季子庙，设苹藻之荐，托为异代之交，为诗以叙意，辞理清典。”[20] 288《南史・萧思话传附介子允传》亦载此事。

从实地调查来看，江苏境内有5处季子庙。一在江阴申港，一在丹阳九里，另三处在常州境内。今江阴申港季子庙、常州三处季子庙均已湮废，仅存十字墓碑。丹阳九里的季子庙香火最盛，经唐、宋、明、清历代修缮，公元1982年又重立十字碑，庙内还保留有许多匾额，很有文物价值。九里季子庙附近，至今仍有涌井，井水沸涌如泉，取而饮之，犹如汽水。

4. 延陵季子碑

延陵季子碑，相传为孔子所书，文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在丹阳市南门九里镇南街北端。石碑高2.4米、宽1.06米、厚0.12米，圆首，碑文为篆书，两行十字。

丹阳市中医院内，有明代刻的十字碑，碑高2.4米、宽1米、厚0.22米。

丹阳作为延陵季子的故里，有责任保护好相关的历史文物与文化遗迹，开展有关的学术研究，以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当前的四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3]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9] 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0] 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责任编辑：许周鹣）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